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沈卫威 著

传统与现代之间

—— 寻找胡适



传统与现代之间

沈卫威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 09 号

传统与现代之间

——寻找胡适

沈卫威著

责任编辑 理 衡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556649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4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6.50 元

ISBN 7-81041-086-5/I·83

目 录

导论：走向开放的胡适研究	1
——回到胡适、超越胡适	
世纪末回眸看胡适	2
时代氛围里的影子与和声	5
胡适遗产的历史命运	13
胡适研究的价值取向	26

思想文化篇

一 从徽州走向世界	31
——徽州文化的心理积淀与超越	
文化控制与自我超越	31
徽州文化的形态与精神	32
一种比较文化视野上的	
观念方法的移植和借鉴	36
“新儒学”伦理与	
徽州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40
士商相通的家庭与徽州文化精神的体认	47
徽州学术的渊源、精神与胡适的认同、改造	53
结语	61

二 “现代新史学”的背后 62

——《古史辨·自序》散论

“现代新史学”：一个

比较文化视野中课题的提出 62

序言杂说：个体文化比较的视角 64

写作心态：呼唤同志，寻求理解 67

胡适的和声：问题、主义、方法 80

题外话：历史不能避讳 94

三 “横看成岭侧成峰” 99

——“胡适派文人集团”的结构形态概观

序说：命题、观念、模式 99

结构形态的外在统摄：

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 102

结构形态的心理范式：自由主义的信念 112

机遇与过程：

“胡适派文人集团”的确立与流变 127

文学历史篇

四 文学选择的文化制约机制 136

——以胡适、鲁迅为视点

上 新文化与新文学:现代文化意义上的阐释

“文化移植”:以全面

反传统为契机的西化派得势 136

“新青年”:挑起“青年文化”

与“父辈文化”的矛盾、冲突 139

科学与民主:涤荡传统

文化的新思潮的原动力 141

“文化焦点”的震撼: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特质的儒家“伦理文化”被革命 145

新思潮冲击波:“集体麻木状”

和“道德逼迫感”被解除 147

文学语言符号变异:新文化

迈向现代化坦途的新载体 150

大众文学得势:新旧文学之争的结果 152

创造性转化:新文学的诞生与辉煌 154

下 文学选择的偶然与必然:

历史的顿挫与文化的制约

选择文学的外在因素:对洋务、维新的幻灭 155

自我与社会:个体文化素质与时代的感召 158

文学创作的內驱力:形象化的

情绪记忆与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 162

五 新文学革命的机缘	168
——《文学改良刍议》的历史考察	
引言	168
白话文学传统的溯源	169
世界文学流向的观照	189
六 新文学运动的截流与探源	201
——从胡适到周作人	
引子	201
上 截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工具理性的强化与现实需要意义上的取得	204
先验的历史观与再现的历史	210
下 探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趋向温和的文化激进主义	220
对新文学历史源头的朦胧感知	224
对新文学历史源流的系统探寻	228
师承效应：半个世纪后的回响	235
结语	239
后记	241

导论：走向开放的胡适研究

——回到胡适，超越胡适

小 引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此时正值全国大规模批判胡适。席间谈起胡适，毛泽东说：“这个人可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①

历史迈着沉重的脚步，即将告别这个激荡的不平凡的百年，走向21世纪。在这世纪末举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回眸看胡适，——我们当抹去历史的尘埃，寻找属于胡适的世界。

^① 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第1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世纪末回眸看胡适

20 世纪,百年激荡。世纪末蓦然回首,胡适早已不在灯火阑珊处,却仍像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尤其是在学术、思想界回荡。人类在进化中智能化着自身,也一直在不自觉地自我毁灭。胡适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来说,虽几度辉煌,几度暗淡,但命运却注定他不会百年孤独。

百年中国,在中华文明史上,虽只是短暂的瞬间,却又有独特的瞬间的辉煌。在最初的 20 年间,中华民族结束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拆除了横亘在国民心目中的精神枷锁,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转折,开始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尽管这不平凡的时光只有 20 年,但历史已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更无法忘却两位使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先行者:孙中山、胡适——一个主导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一个主导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尽管走向现代的中国人与传统中国的告别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留恋,但毕竟迈开了最初的步伐,闪现出最初的辉煌——虽然有的人感到孙中山、胡适的辉煌只是瞬间,孙中山的社会政治“转型”没能使他缔造的中华民国摆脱 30 多年后被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只好到浪花尽处偏安孤岛的难堪和可悲的局面;胡适没能在他全面反传统后缔造(再造)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文明,以致使处在“断裂”、“真空”状态的中国,被强大的社会主义借助胡适在思想文化界所开拓的最初收获——语言文学的大众传媒工具,捷足先登,在后半个世纪主宰大半中国人的命运。^① 两种政治社会机制、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对峙。这就是历史,回眸一弹指,历历近百年。

^① 1962 年胡适病逝前,台湾以徐复观为主力的“批胡”派便持此论。

在启蒙、救亡双重变奏下的前半半个世纪，胡适兼具着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一个近于被多重误解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学术，关注并干预政治。他个人的命运虽然牢牢地维系在一个民族的新生上，但面对那激烈的国共两大势力的决战，他曾作出艰难的选择。而最终不改初衷，把他那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文明梦想系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身上了。

后半半个世纪开始了，一水之隔，同胞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胡适虽一度旅居美国，但却成了一种精神象征，变成了一个影响国共两党、两府的幽灵。共产党虽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他进行了前后几年的争取工作^①，国民党却一直召唤他至台湾的上空。结果，大陆开始了在思想界、学术界为期30年的驱赶胡适幽灵的斗争，台湾也并不因胡适的回归台岛而停止对他为期数载的

① 1948年底，共产党对胡适的争取，参见拙著《胡适传》第259—26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956年大陆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一方面通过曹聚仁（旅居香港）、周鲠生两位胡适的朋友出面争取胡适回大陆。胡适对曹聚仁给他的信的处理是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转交给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对周鲠生作为共产党的外交专家在伦敦通过陈源给胡适的私函，他收藏起来，并在陈源信中关于大陆批胡“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写了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此信直到1990年12月才在台北“胡适纪念馆”作为“胡适诞辰百年纪念”文物展开展出——详情见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实际上，陈源致胡适这封信的内容在1962年——胡适病逝以前，已披露给部分胡适的朋友。胡适刚病逝不久，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发表了李青来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一文，其中有一段话：“在前几年‘共匪’大鸣大放的时候，‘共匪’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先生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先生听了便哈哈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可以看出，王世杰所说的这件事，可能就是周鲠生通过陈源给胡适信的事。——详见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952种《胡适之先生纪念集》第30页。

围剿、攻击。这自然是胡适的幽灵在作怪，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的自由主义、怀疑主义是共产党的敌人^①，而胡适这种理想式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性的怀疑主义思想又何尝不是国民党的敌人！

作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承传者之一的胡适，给 20 世纪中国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这便是我们当今、尤其是世纪末将要追寻并试图解答的问题，因为早在“五四”时代胡适等一代启蒙者提出的走向现代化必由之路上的诸多问题，如民主与科学，在这一个世纪将尽之时还远远没有得以解决，这正是我们在走向 21 世纪前希望解决、或可能解决的问题。也许这便是今天我们在寻找胡适，乃至回到胡适、超越胡适的意义。当然，这已不只是一项简单的学术研究的课题，而更是一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大课题。它的最终答案或称之为解决将需经过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

现实又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如今天的台湾，因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科学的长足发展，胡适已不再是过多关注的中心人物了，因为他重要的遗产之一——理想式的理性的自由主义已被殷海光、雷震等自由主义义士实践性的自由主义所取代，所超越；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遗产，特别是曾显赫一时的建树，则被视为肤浅和功利。但在大陆，尤其是 1978 年以后，胡适对一个开始试图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同步，试图（也只是试图而已）对世界多元的意识形态（包括对台湾、香港提出“一国两制”）接受、认同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来说，却是一个诱人的幽灵，并驱使着人们去寻找他，正视他。一位文学史家曾说过：“英国人很自豪，他们有一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人也应该很自豪，我们

^① 胡适：《共产党为什么要清算胡适的思想》，《胡适作品集》第 25 册《胡适演讲集》（二）第 102 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86 年版。

有一个说不尽的‘五四’。”^①事实上,谁要去说“五四”,就不能不研究胡适。因为胡适紧紧地和那场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连在一起,水乳交融,不可分离。而我这里,只不过想曲径通幽,回到我学术研究的对象中去,但这又只是在寻找曲径之中。因为我关注的常常是探索的过程,也只有在这行动的过程中,我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天地。

时代氛围里的影子与和声

丹纳在探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艺术时,注意到了关于每个文化艺术高峰都有其必需的整体氛围。因此,他在挖掘整理那个时代的遗产时,不但注意到了个别的伟人——具有代表性、导时代潮流的大家、名家,同时还把每位伟人、大家、名家立足的那个整体氛围比喻为合唱的和声。^②这便是他所称的在那亢奋的声音(伟人特有的)之下,还伴随着群体复杂而又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每位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形成一个全民族的和声,并成为时代精神作用下的艺术的文化氛围。“五四”是一代人的“五四”,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五四”,它不为胡适所独有。我们可以尽情地评说每个“五四”时代的巨人,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丰功伟绩,但同时也不容我们忽视在每位巨人那高亢声音下四周的合唱、和声以及那每位巨人的“影子”。因此,从胡适和他的学生这样一个视野去寻找胡适,倒也不失为一个曲径,一种正视历史的态度。

写作“胡适与现代文化人”的题目,只是本专题研究的一个总

① 许志英:《五四文学精神》第25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第3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体设计和研究思维上的张力。这实际上是一个侧面透视，而不是一个正面的视角，因为我不希望把文章写成“胡适与×××”的交游实录——一种平面的扫描或述略（评）式的文章。我只想从有所感上挖掘点内涵、潜隐的东西，阐发一点启示，同时也可以使文章写得合乎自己的个性——活脱、自由一些，而不拘格套。平面的、线性的研究，有许多思路、视角的明晰和评判的便利，但也常常束缚写作者（研究者）的发散性思维的张力。

这一视角的考察，不仅仅是历史的追寻和探幽，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伟人，既代表着这个历史时代的文化精神，也体现着一种历史的选择、文化的变异和个体与社会、时代的机缘。胡适当时处于整个变革中的思想界、学术界的前沿。他在这种历史性剧烈变动中，在这个不可抗拒的文化“转型”中，举足轻重，独领风骚。然而，这场历史的大幕虽是刚刚拉开，但他作为介入的角色已不容退台，并且历史也已昭示，伴随他弹奏时代乐章的还有许多历史人物，且装点了他的风采，充当了他的和声，乃至充当了他的人梯和“牺牲”，但更多的是作了他的衬托。^①在这场伟大的文化“转型”过程中，胡适是一位巨人的形象，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强音，这既是历史赋予他的，也是历史选择了他。翻过来讲，这既是他顺应了历史，又是他做了历史发展趋势的向导，才可能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五四”时代营造了胡适，他才可能超越康有为、梁启超一代人，导引时代的脚步，走向发展变革的新时代。“五四”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自然也不仅仅属于胡适个人，正如同走向社会后的胡适已不再属于胡适个人一样。“五四”是一代人的“五四”，胡适是一代人的胡适。由胡适展示出的是一个时代，那么从一个时代才可能全面认识作为个体存在的胡适，一个人的发散效力是有限的，这正如胡适后来

^① 顾颉刚在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文章称：“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

说自己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一样。他属于开拓型学人，而非学术上的集大成者。他虽在许多领域有开创性建树，但表现出的又是很肤浅，他的后来人在局部的单项研究上很快超越了他。他的不少开拓性工作只是开了个好头，有了令人欣慰的开端，于是便招致后继者的进一步展开。因此，他的工作也就显示出更大的一份属于历史、时代的业绩的价值取向，一种使许多领域“转型”的承前启后的文化贡献。基于这样的视野，我们在“五四”那知识界的学术群体中，便不难看出胡适这个文化巨人投射出的影子，以及建立在这个研究思维导向上的对这个影子的定格、定位的捕捉。——这个视角，我们主要从“胡适和他的学生”的视野里确立。如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并身体力行写《白话文学史》和大量的小说考证，但作为整理国故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学生顾颉刚所建立的“古史辨”派“新史学”。

“五四”后期以顾颉刚为先锋官、钱玄同、胡适为押阵大帅的“新史学”派，在“古史辨”一仗打下之后崛起了。“新史学”与传统旧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疑”与“信”，即“疑古”与“信古”。而为“新史学”派的创立起决定性、实践性作用的当然是顾颉刚——胡适最得意的高足。胡适与顾颉刚的关系，已超乎单纯的师生关系（尽管胡适只比顾颉刚大两岁，前者 1891—1962，后者 1893—1980），实际上，胡适对“新史学”派的崛起起了很大的先导作用。胡适思想上的实证性怀疑主义（又称实验的存疑主义、实用的存疑主义），他的进化的历史演进观、实验的态度（实验主义的两大支柱），实际上成了“新史学”的内在精神“范式”。而“新史学”的“疑古”精神也主要是来自以胡适为主导力量、为适应全面反传统的需要而张扬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①的历史评判态度，并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五四”一代学人在由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过程中对历史的现代意义上

① 《胡适作品集》第 11 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第 160 页。

的重构。无疑,在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史学上有胡适的影子,顾颉刚相对于胡适来说,扮演的是时代的和声,而今天,我们追溯历史的进程,检讨“新史学”的贡献,又必须正视这一点,即在史学研究上,顾颉刚又明显超越了他的老师胡适,推动了学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他作为学者的历史使命。顾颉刚相对于“五四”后期“新史学”派对现代学术史的意义在于,他体现了费希特所说的“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①。而胡适与顾颉刚的不同在于,他对“新史学”是一种理性的观念上的启导,而顾颉刚则是实践意义上的确立。胡适是属于那种他的进步决定着“五四”文化“转型”时期其他多个领域的进步,并走在其他领域前头,以便为他们开辟道路的先驱型学者。与顾颉刚比,他的学术精神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因此,他作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并且比顾颉刚、钱玄同等一批“新史学”派的人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这便是费希特所谓的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②

作为“五四”文化巨人,胡适走向新文化运动的前沿,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独立的学者身份出现的。尽管他当时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又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胡适的一生中,只有抗战救亡时一度出任过驻美大使,且为学者大使,并无“全权”可言。胡适生性胆小怕事,好名爱面子,不是一块可塑的职业政治家的料。马克斯·韦伯认为,一切职业政治家是在“与魔鬼的势力为伍”,“谁要探索如何使自己的灵魂解脱,他人的灵魂得救,他不会在政治这条道上探索,因为政治有全然不同的任务:

① [德]费希特著、梁志学等译:《论学者的使命》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德]费希特著、梁志学等译:《论学者的使命》第38页。

只能用暴力来解决的任务”；“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迁所要负的责任”^①。这种“压力”实际上是人格的内在力量，这种“责任”则是承受心理变态、人格扭曲、人性扼制的平衡所表现出的“纪律”。终胡适一生，他关注乃至介入的只是“边缘政治”，而未进入政治的重要概念之中。以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胡适的“边缘政治”只是在决策主义、技术主义之外的实用主义模式上，“通过这种方式，实用的问题能够被转换为学术的问题，学术成果又能进一步作为科学信息反馈到具有接受能力的公众中去”，并以这种（实用主义）模式“满足主张以刺激政体改善的方式去联系知识、技术与实践的民主呼声”^②。专业献身精神是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者的必需品质，并且都存在着伦理意义的“人格”。马克斯·韦伯使用的“人格”是指“与一定的最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内在的牢固关系，它寻出有目标的人生与合目的的理性行动”^③。以政治为业者必须保持强烈的政治“人格”。也就是说以政治为业者必须时刻同自己本身的浅薄和过于人情味的敌人——“庸俗不堪的虚荣心”^④作斗争。而胡适则完全不具备这种政治“人格”之“强”，因为他的胆小怕事，他的虚荣、爱面子的个性，他满面春风和为人处事时浓重的“人情味”便是以政治为业的“敌人”。

1917年胡适的文章出现在《新青年》，虽然是以学术为出发点，但是也造成了对思想界文化界的巨大冲击——反封建思想启

① [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以政治为业》，《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第10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② 转引自[德]W·施鲁赫特著、王容芬译：《〈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特色》，《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第116页。

③ 转引自[德]W·施鲁赫特著、王容芬译：《〈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特色》，《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第115页。

④ [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以政治为业》，《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第91页。

蒙运动。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他接办《每周评论》，“忍不住要谈政治了”，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通过学术介入政治的，而且终生如此。他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代立身学术而不完全投身政治（不做官，自称办教育不算为官）的知识分子，以“自由学人”自居，而又有十分浓厚的政治兴趣，时常染指、介入。他的思想意识原本为自由主义所支配，但又不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而是另一极端——现政府的改良者、批判者、监督者。他的思想属于政治社会意识的右倾，而非左倾。胡适有一个得意的学生，也是“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①傅斯年，就政治兴趣和学术兴趣，特别是从事“边缘政治”的态度，完全是胡适的影子，师生在许多地方如同一人。他们的思想品位处在一个水准线上。

因此，从顾颉刚、傅斯年身上，我们不仅可以找到胡适的影子，还可以看到学术与政治这一孪生兄弟由胡适播种下的文化基因——顾颉刚继承胡适的学术精神，而傅斯年则更多的是继承胡适的政治精神。历史使顾、傅两人成为胡适学术、政治的影子，同时也使他俩成为胡适的和声。他们在望其师之项背时，时时充当着其师长的传声筒，乃至将师长的精神发扬光大。

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象的文化心理的底蕴，即顾颉刚所说的“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的主导倾向问题。因为在当时，胡适对于顾颉刚、傅斯年来说是磁石，顾、傅则是已具钢铁元素的铁块。胡适与他们之间，是顺乎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磁力场。没有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可以成为另外一类学者或政客；没有顾、傅，胡适可能吸引另外一些人，再加铸造。他们之间的吸引和被吸，是一种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现

^① 此话出自胡适致傅斯年夫人俞大绾信，原句系英文，此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157—215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